

访谈

白明
钟伟锋

白明 (Jude Blanchette) 是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他是研究中国政治局势的前沿专家, 在兰德公司侧重于中国在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和国际竞争方面遇到的挑战。白明发表了大量作品, 包括《中国的新红卫兵: 激进主义的回归与毛泽东的重生》一书

钟伟锋是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 (Mercatus Center) 研究员、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高级顾问。他是中国问题专家, 也是开源的政策变化指数 (Policy Change Index) 的创建者, 用人工智能分析独裁国家的官方宣传, 从而预测它们的政策走向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2期
2025年5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 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 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习近平的中国 经济向何处 去?



白明



钟伟锋

编按：习近平掌权 13 年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经济结构面对重重挑战。这个体制的演变逻辑是什么，会向何处去？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目前的困境？是否有潜在的其他选择与某种真正的复兴战略？受《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员钟伟锋与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进行了以下对谈。他们的对话为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模式”提供了来自国际智库的深度洞察。

钟：让我先问一下你的学术生涯起源。你的中国研究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什么让你走上了这条精彩的职业道路？

白：我不知道用“精彩”这个词是否恰当，但这条职业道路确实很有趣，也很令人兴奋。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是 25 年前了。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在北京理工大学交换学习。我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一个月到达北京的。从北京老机场坐车到北京理工大学宿舍的路上，我立刻

就被中国迷住了。部分原因是我在美国佛蒙特州农村长大，我从来没有去过像北京这么大的地方。

在到达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我感到北京在 2001 年秋天有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中充满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乐观情绪。那里的中国学生都很乐观，他们在思考着中国正式融入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这种乐观不在于融入一个正式的国际贸易体系，而是因为中国现在真正成为了一个全球的参与者，外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

当然，我在北京听到的关于中国可能走向的观点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我不想过早下结论，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对美国的很多讨论感到沮丧，这些讨论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地位是早就注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列宁主义制度所走的固定道路。但我一直认为中国有很多条路可走。在 2001 年，我感觉中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可供选择，而这些路径与它今天的位置不同。因此，第一年在中国的经历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2007 年，我再次回到中国，搬到了上海。对于我们讨论的重点来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 2010 年，那时我正在人民大学附近开会，听说了一家由一些新毛主义者经营的书店，叫做“乌有之乡”。我出于好奇就去逛逛。他们的书店离人民大学的北门不远。这开启了我人生中的新篇章（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因为我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家书店的情景。让我感到最有趣的是：里面挤满了年轻的中国人，但他们与我遇到的大多数学生不同。我遇到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打算去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或者去美国学习。但是这些年轻人却坐在书店的楼梯上，或者挤在角落里，在阅读《毛泽东思想》，阅读列宁的作品。

所以，那次偶然进入这个“乌托邦”书店经历，可能是影响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事件。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试着去理解这样一个悖论：中国正在向现代化、全球化迈进，而有些人却想回到过去，往共产主义制度寻根。

钟：我能体会到你所指的这种“悖论”。我在2002年上大学。那时候（甚至现在也还是这样），有必修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大学上课时，我会上完一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然后紧接着上一节西方微观经济学基础课。这种矛盾简直令人震惊，因为我们会听老师讲关于公有制的东西，然后又要学习（西方的）微观经济，而在中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根据上一门课，我们不应该有下一门课的内容。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因为这种矛盾，或者说认知矛盾失调，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有些人可能会回到毛式的极端，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想要更多的自由。

白：是啊，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后来理解到，一些看似截然相反的东西，比如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可能更具流动性，它们并不一定是两个极端，或者二元对立。对我来说，学习和理解中国的过程，并不仅是探索这样的紧张关系，我还试图找出这些紧张关系的背后，矛盾是如何共存的。中国在1989年后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合作空间比我在成长过程中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我成长的时代，基本上市场或者国家二选一。在美国，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产业政策，我们在贸易和关税政策上也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中国是第一个开始思考一种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把很多其他的国家拉向了这个方向。

钟：您对如下的这个反驳意见有什么看法呢？您提到了美国对中国的传统讨论方式。我认为这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流派就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伦·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Robinson) 的研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国似乎是一个成功的反例，因为它没有政治自由，但它却有经济自由，这导致了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根据我对他们研究的理解，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增长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最终中国人可能会出现足够强烈的对自由的需求，他们甚至会拥有政治自由，甚至会有民主，从而巩固支持增长的经济政策、经济自由、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最终倒退回一个悲观的厄运。我猜过去 10 年似乎证明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至少目前中国的经济趋势似乎与这种更悲观的预测一致。您对这个框架有什么看法？

白：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 1980 年出版的，它看起来就会非常不准确，因为它描述的是促进增长的结构必要条件。按照他们的逻辑，你可能会认为中国试图建立一个明显由国家主导的但仍然实施市场经济的实验是不会成功的。另外，我并不是对中国政府自 1976 年以来所做的所有政策选择表示赞赏，但我确实认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一直都没有预测能力，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违背了这种经济引力定律。我认为你刚才说的最后一点很好，那就是时间会证明阿西莫格鲁他们对剥削性制度的批评是否正确。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显然是中国复兴的唯一最大的障碍。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当时没有在领导层竞争中获胜，而李克强是 2012 年秋天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常委名单时的领头人，你认为我们还会

有今天的局面吗？换句话说，你刚提出的观点（我也有点同意），即过去10年中国由国家干预和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局限性，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还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我认为现在对美国也存在同样的讨论。唐纳德·川普是原因还是症状？我想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实际上，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结构很重要，而像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几乎没有任何制衡，甚至在党内也是如此。这是否一定会阻碍半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说你的确需要一个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他对自己想要把国家带向何方有着清晰的愿景，但是他的愿景却不包括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市场，所以我不知道。

钟：对。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个人怎么判断中国早期成功的原因，例如是是什么带来了中国经济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的成功？我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可以说一切都归结到钱。因为你看地方政府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拍卖和出售土地给开发商。

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相当神奇，因为根据中国法律，土地是国家所有的，或者是农村集体所有的。法律基本上规定城市土地必须由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则是集体所有。但是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农村？两者的边界是由国家划定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开始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又变得更大一些……。每次重新划定地界时，新纳入城市边界的土地就会变成国家所有，也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于是地方政府就开始出售更多的土地。我的观点是，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土地与其他许多经济条件是互补的。如果你的经

济非常糟糕，土地也不会有价值。因此，为了以高价出售土地，地方政府开始有强烈的动力提供促进经济增长的机构和政策。他们会试图吸引投资者，比如免费的电力、免费的水，或者提供其他的好处。这样企业家就在他们自己的城市而不是其他的城市建立工厂。

我认为习近平的特殊性，也就是你刚提到的，在这里非常重要。我认为自从他上任以来，他就开始插手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因为各地显然存在房地产泡沫，中央便开始提出要求，要介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过程，想看看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卖地过程中当然会有腐败，因为那是让中国经济车轮运转的润滑油。因此，我认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有了更多的介入。我认为这就破坏了中国经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讨论而言，我认为中央政府很难不试图把手伸进地方政府的口袋。这需要克制，而克制并不可靠。也许这就是阿西莫格鲁说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来防止中央政府的攫取，那么即使地方政府暂时有良好的动机来发展经济，这种动机也不会持续太久。

白：是的。另外我认为我们可能也没有清晰地定义我们谈论的术语。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搁置阿西莫格鲁的命题。我注意到，从 2012 年左右开始到现在 2025 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 13 年，政府有意图地重新调整了整个系统，包括地方和省级层面的激励结构，当然还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发展模式。这让我觉得很难对从 1978 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时期进行分拆和分析。

2012 年可能不是真正的分水岭。真正的分水岭可能是后来的事情。我很想知道的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是什么时候从“一切照旧”的政局转变成现在的全新的局面？我感觉在习近平任内，有一些明显的重整政治架构的事件，但很难确定哪一个是单一的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有太多刻意的政府干预。中国从 2011 年经济增长就开始放缓，但是 2020 年的关于房地产的“三条红线”政策，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更为急剧下滑的最大的单一因素。这同时也包括了在新冠政策上的乱决策，以及在房地产领域的一系列干预，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此外，通过取消土地交易这一最大的收入来源，实际上也重新配置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更早一些，2018 年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16 年，习近平升任自己为“核心”。2014 年宣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概念发布之后，“国家安全”的势力，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开始迅速膨胀，还新添置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法。

所以，再次回到刚才的问题，实际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政局，有多少是习近平个人的“功劳”。如果我们把中国比喻为整个时代趋势里的一艘船，那习近平这个掌舵人显然不是随波逐流。他也许没有把中国带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他选择的方向显然与前两届中国领导人不同。

因此，我想表达的是，我对关于中国发展，通过回到上世纪 90 年代来解释今天的那些论述持怀疑态度。不是说传承和渊源不重要，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习近平是一位非常不同的领导人，他的政策

和战略选择塑造了今天的中国，而这并不是一个共产党的执政下的必然。

钟：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那你认为习近平可能有多少种方式来扭转现在的这种经济颓势呢？（自愿下台除外）

白：哈哈！我认为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生产率放缓、消费不足、人口挑战、地方政府财政等问题，即便在中国国内的政策界，其实也完全不缺乏好的应对之策。我觉得习近平身上的一个政治谜题是，他显然拥有非常大的政治资本和权力。如果让我给习近平建议，我会说中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首要任务都是税制改革。中国不仅中央税制有根本性问题，地方税制也有问题。这影响了中国的财政健康，影响了中国筹集资金的能力，也妨碍了习近平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策目标。更不用说解决中国的许多结构性挑战和一些政府不得不应对的挑战：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给医疗系统带来更大压力，对养老金制度带来更大压力，对广大家庭也会带来更大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与父母同住，他们的父母会开始生病、需要医疗开支。

理论上，习近平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明显的措施，领导层可以在市场改革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需要民主化（尽管我们很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而是仅仅在一个技术官僚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税制改革、财政改革、市场改革。此外，中国的医疗系统目前状况相当糟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当然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医疗系统可能比美国的医疗系统更加资本主义化）另据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Scott Rozelle）研究，中国农村儿童也面临发展和教育的挑战。北京的领导层其实可以实施一个真正的复兴战略，通过解决中国内部面临的一些深刻挑战，使中国在全球处于更强的竞争地位。平

心而论，美国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根本性的挑战。我的意思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总之，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采取一些明确的举措。

我只是不认为习近平对这些有任何兴趣。我认为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他对如何实现大国地位的定义却很狭隘。我认为他“沉迷”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以致忽略了我认为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更为紧迫的长期挑战：税收和财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从 2013 年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听很多人说很快就会转向改革，但现在是 2025 年，他们还没有转向改革。我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的问题越多，地缘政治的阻力越大，他们改革的可能性就越小。现在，北京需要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走进习近平的办公室，敲敲门说，“同志，我们走错方向了”。我认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激发了习近平最糟糕的本能。我认为这促使他加倍重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国家安全，这使他对外国资本更加敌视。所有这些加起来，最糟糕的本能就带来了最糟糕的局面。这就是我的想法。

钟：国家实力最终是经济实力，这为什么不是一个非常简单、几乎是太直观的道理？为什么习就不能意识到，在任何地缘政治竞争中取胜，中国都需要强大的经济？

白：让我们继续做魔鬼的代言人。我总是试图从决策者制定决策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而不是从你和我认为的角度思考。此外，围绕决策者制定决策的信息“生态系统”是什么？习近平可能会说，你是对的，经济实力确实很重要。你瞧，比亚迪昨天刚刚宣布，他们掌握了新的充电技术，可以在五分钟内为汽车充满电。DeepSeek 刚刚证明，美国需要大量资金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整个模式都是错误的。而中国做到了，而且成本很低。

我认为习会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电池技术（如宁德时代）、华为（死而复活）。因此，习近平也可能会收到手下的简报说：同志，你所做的一切都很有效，产业政策正在发挥作用，我们在机器人、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美国这个叫伟锋的家伙却说我们这种模式行不通，他在胡说什么呢？

我的同事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最近为我工作的兰德公司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可以以两种方式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宏观叙述和微观叙述。宏观的是经济放缓的故事：债务过剩、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对地方政府财政产生了各种连锁影响）、以及人口结构的挑战。

微观的是新经济的故事。现在，新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无论是就业还是产出方面，但它是吸引几乎所有头条新闻的领域，比如比亚迪、华为、宁德时代、DeepSeek。因此，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你是在看新经济的故事吗？如果是这样，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情况还不错。或者你是在看宏观故事吗？那样来看，中国就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类似于我们之前讨论的，关键在于，在政治体制不断走向越来越集中的政治控制的情况下，新经济的成功是否可持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至今为止，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功，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成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是说尽管有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仍然取得了这些成功？

钟：嗯，也许有人真的可以说习近平拿到的简报是正确的。他们可能是对的。DeepSeek 确实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案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施加了所有限制，反而激发了中国的创新。他们绕开了美国的限制，

而且成功了。

我甚至认为，这些微观故事，可以上升到宏观层面。有些国家似乎是在外部威胁的条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比如处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中间的以色列，或者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以来一直为自然资源匮乏而忧心忡忡，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经济体或许也是一个例子，他们都成功了。因此，威胁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也许是一种激励。这个逻辑也许对 DeepSeek 有用，我不知道对习近平是否奏效。

白：顺便提一下，我认为 DeepSeek 的故事与中国产业政策的故事截然不同。DeepSeek 并不是在中国产业政策的生态系统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DeepSeek 更接近于私营部门的玩法。而华为、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是非常不同的故事。那些公司绝对更像是“产业政策的成功”，注意我用了引号。

当然，产业政策不能只看赢家。你需要看它的整体，并对它是否物有所值进行评估。要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在毫无进展的公司、项目和技术上。每个地方政府都需要有自己的创新集群。所以有很多钱都被浪费了。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电动汽车品牌。一个月前，我刚去过北京，看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汽车。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奏效，以及为什么会奏效。我们的对话更多的是在讨论，习近平怎样才能获得他所需要的反馈，从而明白政策议程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我确信，他得到的信息很可能是说，他走的路线很正确。另外，如果你是他的顾问，你看到了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你会认为现在是让市场自由分配资源的时候吗？或者你会告诉习：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朝哪个方向

走、我们知道我们掌握了所需的技术、我们也知道取得这些技术突破的时间有限。所以我认为北京可能没有太多自由市场的氛围。而且坦率地说，甚至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没有太多自由市场的氛围。

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咱们现在从经济方面转向政治方面，你认为中国的政治将如何走向民主的未来？中国能实现民主吗？这正是本刊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中国会有民主的那一天吗？

白：不幸的现实是，至少在我来看，习近平及其领导集团将持续到他在任上去世。当然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独特性。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庆祝乔治·华盛顿的故事，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愿交出权力是多么不寻常的事情。而在今天美国，唐纳德·川普却曾开玩笑说他想（在这个任期后）继续保持他的权力，并自称为国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第 22 条）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 1982 年中国宪法改革中为国家主席的职位设定了任期限制，因为他们知道权力是需要一些约束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后来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当然我也愿意接受一些更乐观的想法，即习近平可能不会掌权至死，而是到未来某个时期，当党内的管理不善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精英阶层的异议也变得更加强烈的时候。当然中国这种列宁主义体制对来自于精英阶层内部的挑战非常有韧性。但我们只善于回顾过去，解释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就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我不记得有谁在那之前就预测过。我个人的感觉是，习近平的权力相当稳固，但我也知道，当政治风波发生，它们几乎总是在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发生。

作为一个基本事实，习近平相对年轻，和美国领导人相比，他年轻了十多岁。我认为他还会掌权 10 到 15 年。所以你刚才的问题其实是：习近平下台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我无法预测。但不幸的是，当一个独裁体制的领导人在任上去世时，继任的领导人往往在很多情况下更糟糕，更倾向反自由。我们可能过度解读了邓小平当政的历史，即认为从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到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接班是顺理成章的，因此也认为习近平之后，情况可能会再次向市场的方向发展。但如果我们纵观独裁体制下的大量证据，从独裁者到一个务实派的过渡，其实并不典型。（我们可以争论邓小平是否是独裁者，但他毫无疑问比毛泽东更务实得多。）我们可能不应该赌在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会持有多少务实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政党制度有生存的韧性，胜出权力斗争的人很可能是相当残酷的。为了赢得这场权力斗争，你必须相当残酷。

所以我很诚实地说，我相当悲观，我也对全球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感到悲观。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处于二战后开始的一个长周期的末尾，尽管会有起伏，但这个长周期似乎正在结束，支撑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的许多制度正受到严重攻击。

这不仅仅是中国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所以我非常担心全球民主的健康状况，我非常担心美国的民主健康状况。这不仅仅是关于习近平下台后中国会怎么样，而是更广泛地说，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体系是否能够在前进中自我复制。

钟：在这个沉重的语境下，我很好奇你对未来的看法，尤其是对中国。也许中国未来的十年并不会与现在有太大的不同，但是看得再远一点，你在

研究方面关注什么？我在开头提到过，你是兰德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主任。你对中心有什么愿景？在未来十年内，鉴于我们显然面临的所有限制，中国的研究工作将会在哪些方面最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白：是的，谢谢。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谈谈我们中国研究中心。我们是相当新的研究机构，某种意义上还需站稳脚跟。

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是确保我们在讨论政策时填补一些空白。比如哪些关于中国的研究领域虽然重要，但却是大多数智库无法处理的。在学术界，有很多出色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但问题是，正如你所知道的，学术工作需要太长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它并没有以一种能够为决策者提供见解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我们试图在学术界和智库界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正在评估中国产业政策成败的领域和原因。我们不仅仅将产业政策作为一个总体，而是真正理解中国在哪些领域更有可能在产业政策方面取得成功，以及对于我们认为不会奏效的领域，去探究其中的原因和差异。

我还在进行一个项目，评估习近平在执政的过去 13 年中做出的关键决策，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他在整体上如何做出决策的模式。我发现许多研究习近平的著作，都不是基于对他在过去 13 年中做出的所有政策决定的仔细研究，而是基于读了他的几篇演讲，然后就下结论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台湾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或是次要于他的其他目标。因此，我们将仔细研究他在 13 年里的一系列国内外政策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并尝试总结出一些科学的规律。

我们将启动一个播客。我曾经在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CSIS）运营过一个类似的播客。我们将开始尝试采访像你这样从事有趣的中国研究的学者，这样就可以帮助播客的中国以外的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钟：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令人兴奋。我从我们的聊天中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希望你下次再来，与我们的读者谈论更多关于中国的话题。

白：谢谢。非常荣幸能参与其中。

（此访谈用英文进行，由余浩风博士译成中文）